



社科·学术文集

# 从鲁迅到毛泽东

支克坚中国现代文学思潮论集

CONG LUXUN  
DAO  
MAOZEDONG

ZHIKEJIAN ZHONGGUO  
XIANDAI WENXUE  
SICHAO LUNJI

关于五四新文学传统

论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小资产阶级问题

关于新文学的评价标准

鲁迅与中国现代文艺思潮

论鲁迅“激进”

中国自由主义文学在昨天和今天

两种文艺思潮比较中的鲁迅

冯雪峰文艺理论的背景和内在矛盾

从鲁迅到毛泽东

——关于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革命文艺思潮的变化，

兼论周扬和胡风在变化中的地位

鲁迅和胡适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若干问题的思考

关于新时期文艺上不再提两个口号

我们的学科需要这样的志士仁人

——读樊骏著《中国现代文学论集》

支克坚



邵宁宁



读者出版集团  
甘肃教育出版社



社科·学术文集

013033172

I209.6  
80

# 从鲁迅到毛泽东

支克坚中国现代文学思潮论集

支克坚 著 邵宁宁 编



CONG LUXUN  
DAO  
MAOZEDONG  
ZHIKEJIAN ZHONGGUO  
XIANDAI WENXUE  
SICHAO LUNJI



读者出版集团  
甘肃教育出版社



北航

C1640240

I209.6  
8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鲁迅到毛泽东:支克坚中国现代文学思潮论集 /  
支克坚著;邵宁宁编. --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  
2010.2

ISBN 978-7-5423-2254-8

I. 从… II. ①支… ②邵… III. ①文艺思潮—文  
学研究—中国—现代—文集 IV. ①I209.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25786 号

责任编辑:金海峰 赵鹏

装帧设计:吉 庆

从鲁迅到毛泽东

——支克坚中国现代文学思潮论集

支克坚 著 邵宁宁 编

甘肃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730030 兰州市南滨河东路 520 号)

www.gscph.com 0931-8773255

天水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 26 插页 3 字数 396 千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 000

ISBN 978-7-5423-2254-8 定价: 45.00 元

# 用个性化方式响应时代对这一代学者的要求

——支克坚先生学术思想和贡献初议

钱理群

听到支克坚先生远行的消息，我在感到痛惜的同时，更感到内疚：我欠了支先生一笔文债。早在几年前，我就应解志熙之约，准备写一篇评论支先生的力作《周扬论》的文章，支先生也知道我要写这篇文章，似乎有所期待。我当然感到了这样的期待的分量，因此，总想把先生的全部论著都研究一遍再作文，这样反而把时间耽搁了，迟迟不能动笔，以至成了永远的遗憾。而且，我到现在也没有读完先生的全部著作，只能根据手头有的几篇先生最近几年发表的文章，谈谈我对他的学术思想与贡献的印象，以表示我的追怀之情。希望以后还有机会再作更为从容和充分的学术的讨论：我坚信，支克坚先生的研究，是要进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史的。

我之所以一直想作支先生的学术思想与贡献的研究，首先是支先生学品和人品对我的吸引，同时也是因为我把他看做是现代文学研究的“第二代”学者的突出代表和典型，这是我这些年陆续在做的“现代文学研究学术发展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我看来，学术界对这第二代学者的关注和评价远远不够，这是会妨碍我们对现代文学学科发展史和历史传统的认识 and 把握的。我在接受一位在读的博士生的访谈时，曾特地谈到“八十年代现代文学的研究地图”问题。我说：“它是以第一代学者为核心，形成了若干研究中心。首先是北京、上海，北京以李何林、王瑶、唐弢三大巨头为核心，以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北大、北师大为三大中心，上海以贾植芳、钱谷融为核心，有华东师大和复旦大学两大中心。然后是：南京（以陈瘦竹为核心，南京大学为中心），山东（以田仲济、孙昌熙、薛绥之为核心，山东大学，山东师范大学，聊城师范大学为中心），广东（以吴宏聪、陈则光为核心，以中山大学为中心），陕西（以单演义为核心，陕西师范大学为中心），四川（以华

忱之为核心，四川大学为中心)，河南（以任访秋为核心，河南大学为中心），福建（以俞元桂为核心，福建师范大学为中心）。此外，还有几个以第二代学者为核心的集中点，如武汉（以陆耀东、黄曼君为核心，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为中心），甘肃（以支克坚、吴小美为核心，兰州大学、西北师范大学为中心），东北（以孙中田为核心，吉林大学、辽宁大学为中心），江苏（以范伯群、曾华鹏为核心，苏州大学、扬州师范大学为中心）。每一个中心，都集中了老、中、青三代学人，而且彼此都配合得非常好，任何新的思想、观念的提出，都会得到积极的响应，也包括不同意见的争论”，在八十年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科能够得到迅猛而健全的发展，这是一个重要原因和条件。从这幅研究地图里，就不难看出包括支克坚先生在内的第二代学人的突出地位，他们或者自成研究核心，或者在第一代学者核心周围发挥独特作用，如北京文研所的樊骏、马良春、卓如、吴子敏，北大的严家炎、乐黛云、孙玉石，北师大的杨占升，南京大学的叶子铭、许志英、董健，河南大学的刘增杰等等，都以学术研究和组织工作，以及对新一代学者的扶植、培养中的出色表现为学科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较早谈到第二代学者的特点的，是王瑶先生。他在《研究问题要有历史感》一文（收《润华集》，《王瑶全集》第8卷）中说：“现代文学这门课一向被认为是政治性很强的课程，所以教员也多半是‘双肩挑’干部。他们既是政治干部，又是专业教师。他们都是历次政治运动的领导者或积极参加者，埋头走‘白专’道路的人极少。他们身上有许多优点，有一定的马列主义修养，有政治敏感，接受新事物比较快；但由于历史原因，知识面比较窄，业务基础尚欠深广，外语和古代文化知识较差”。当然，正如王瑶先生自己所说，“这是就一般情况说的”，具体到第二代学者中的个人，是有很大差异的，并不都如王瑶先生所言。但王瑶先生的几点概括，也很值得注意，并且和我们下面的讨论很有关系。一是第二代学者大都有“马列主义的修养”，这是他们的理论根底，是和以后几代学人相区别的。其次，他们都是革命传统培育出来的，而且是历史的参与者，革命的正面影响和负面教训在他们身上都有深刻的印记，而且在很长时间内是纠缠在一起的，这可能成为他们的历史包袱，但如果转化得好，又会成为他们特有的精神财富。其三，他们对新事物的敏感，使他们有可能随着时代的进步，不断吸取新的思想资源，纠正、调整和发展



自己；但他们中也会有些人因一味趋新而失去自己。事实上，对他们所经历、参与的革命，他们的革命经验，也包括对革命文化、文学的研究经验，是存在着三种态度的。一种是拒绝作任何反思，任何时候都以“政治正确”自居，并对提出质疑者大加讨伐，就成了旧的政治与文学权力和秩序的维护者。一种是全盘否定，趋从自己其实并不甚了然的最新思潮，或许会引人注目于一时，其实是无根底而难持久的。而另一种，就如支克坚先生所主张，并身体力行的，就是采取科学的、分析的态度，“在坚决地，义无反顾地打破由历史造成的局限的同时，也须认真总结其中的科学的、有益的东西，并使其有助于学科在今天，能够真正像樊骏所说，经过自己的途径，用自己的方式，‘提高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和修养’”（《我们的学科需要这样的志士仁人——读樊骏著〈中国现代文学论集〉》）。

值得注意的，是支克坚先生认为，“这项工作只能由第二代学者来做”，这是他们的历史责任。这就说到了本文讨论的重心，这也是支先生在同一篇文章中所提出的一个命题：“以非常‘个性化’的方式，响应时代对这一代学者的要求”。应该说，时刻感受到“时代”对自己“这一代”的“要求”的压力，并积极予以“响应”，这本身就是第二代学者的一个重要的、基本的历史、学术品格。它的本质，就是我近年不断谈到的“承担意识”，或者叫“使命感”，它包含了三个层面，即对自我的承担，对学术的承担，以及对时代、历史、国家、民族，以至人类的承担，而这样的承担，绝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绝不停留于口头的宣言，而是内化为日常学术工作，以至日常生活的实践，形成实践伦理与习惯的。这样的承担意识、使命感，是构成了现代文学研究的传统的，它显然来自第一代，经过第二代的承传，又显然深刻地影响了我们这些第三代学人。但在今天，对新的研究者却越来越陌生。这也是有深刻的时代和社会原因的，需要另作讨论。

还值得注意的，是支克坚先生在这里所强调的，对时代要求的响应，必须是“以非常‘个性化’的方式”。这本身就是对历史经验、教训的一个总结。在第二代学者成长的年代，是从根本上否认学术个性化的，这些年学界似乎又走到另一个极端，文学与文学研究成为纯粹个人的事情。如何认识学术研究的个人性与社会性的关系，就成为这一代学人首先必须解决的，并会不断面对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支先生在他最后公开发表的论文《论革命文学的理论遗产》（文载《鲁迅研究月刊》

2008年1期)里对此作出了很好的总结:“个人性质的精神活动中,体现着社会的性质”,“须知不赞成以文艺为个人的事业不等于就可以否定文艺作为精神活动的个人的性质;反过来,以文艺为个人的事业,不等于你那个精神活动就没有社会性质”,这个原则当然也适合于文学研究。因此,支克坚先生所提出的“以个性化方式,响应时代对这一代学者的要求”的命题,就是建立在这样的学术研究的个人性质与社会性质的辩证统一的认识基础上的,是有着深厚的历史内容的。

我感兴趣,并要追问的,是支克坚先生本人,是以怎样的“个性化”方式去回应时代对自己的召唤与要求的,他因此在第二代学者中取得了怎样的特殊地位,作出了怎样独特的贡献。我于是注意到,他的这一命题是在评价樊骏先生的代表作《中国现代文学论集》时提出的,这大概不是偶然的。在我看来,在第二代学人中,樊骏先生和支克坚先生都是以理论素养、兴趣和能力见长的,因此,他们的著述都显示了较高的理论品格和理论含量。而理论性不强,恰恰是我们这个学科的一个重要弱点。虽然近二十年我们学界也不断掀起理论热与方法热,但除个别学者确有理论建树外,读许多学者的理论论述和研究著作常有食洋不化或空泛不实的感觉,像樊骏先生和支克坚先生这样把他们所坚守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和中国现代文学及其研究的实际结合得如此之好的,理论品格与历史品格相统一的,却并不多见。因此,我常常将他们二位的著作放在一起,以为是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独特风景的。

当然,他们之间似乎也有所分工。如支克坚先生所指出的,樊骏先生更注重现代文学的学科建设,在全面、系统总结第一代前辈学者的学术道路、历史经验和对学科发展现状的及时总结上,下了很大工夫,因而对整个学科的发展,具有更大的影响。这除了樊骏先生本人的素质、兴趣以外,也和他所处的学术中心位置直接相关。支克坚先生则始终在西北边陲,默默地产生着他的影响。但他仍是胸有全局的,因此,他对樊骏的许多现代文学研究的战略思想是独有会心,并有自己的创造性发挥的。本文一再引述的《我们的学科需要这样的志士仁人》,是我所看到的迄今为止,对樊骏先生的学术思想的阐述最为到位的一篇力作。这里仅说一点。支克坚先生十分重视与强调樊骏先生关于现代文学学科发展的两个基本思想:一是要实现“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一个根本性变化,将原本从属于政治、为政治服务的学

科，变成独立的、真正具有学术性质的学科”，并完成“从单纯的文学批评向综合的历史研究的转化”；同时，又要坚持“和新的时代相结合”。支克坚先生说，这是他们第二代学者的一个“共识”，其实也是他们共同的努力方向和共同贡献。在我看来，这也是支克坚先生的现代文学研究所要坚持的两个基本点：一是坚持科学性和现代文学学科的“历史研究”性质，一是坚持“和新时代结合”，为今天的文学和学术发展提供历史和理论资源。

而支克坚先生的关注，是更为具体的：在这样的学科转变过程中，像自己这一代学者究竟能够发挥怎样的作用？于是，就有了这样的定位：“看起来，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这门学科中，打旗子，引领风骚，不是第二代学者的事情”，这一代人应该和可能做的，是“起到某种桥梁的作用”——这确实有些类似于鲁迅所说的“历史中间物”。支先生并且具体描述说：“它就是一座站在新的历史高度上，运用社会学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或者说社会的历史的观点和方法，从新民主主义的文学史观，通向现代化文学史观的桥梁”。这一论述，在我看来，可能存在着将所谓“现代化文学史观”理想化之嫌，未必完全符合支先生的认识；但我更看重的是他所提出的问题。我们知道，第二代学者曾深受新民主主义文学史观，社会学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方法的影响，并一度发展到完全否认所谓“旧民主主义文学”，以及庸俗社会学的极端，对由此造成的研究局限性，支克坚先生曾作过许多深刻、中肯的反思。而现在，支先生所提出的问题是，经过了这样的彻底的批判以后，能不能从中剥离出合理的因素，在他看来，我们不能将孩子和脏水一起泼出，“真正科学的态度，正确的做法，不是简单地否定和抛弃它们，而是恢复它们的本来面目，原有的品格”。我想，他的这一思想，至今还不失去其启示意义。

如果说樊骏先生个人的主要研究领域是老舍小说的研究，那么，支克坚的学术主要贡献，是现代思潮史的研究，而他的主要关注点，又集中于对“革命文学和自由主义文学两种思潮”的研究，他的代表作《周扬论》、《冯雪峰论》，都是这方面研究的主要成果。而他后期发表的论文也依然是《论革命文学的理论遗产》和《中国自由主义文学在昨天和今天》（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3年1期），可见他的关注是一以贯之的。这是以他的一个基本学术判断为基础的：五四民主主义传统有两条路，一条转向社会主义，一条转向自由主义，它们都继承了五四传统，



却有了不同的发展方向，革命文学和自由主义文学两种文学和思潮及其相互补充与冲突，构成了新文学发展的基本内容和根本问题。因此，在他看来，“弄清革命文学和自由主义文学比较的实质，是我们认识中国现代诸多文学和文化现象的钥匙”。

我注意到，支先生对这两大文学与思潮的研究有两个特点。首先有明确的当代指向，因此，他的问题意识是：“革命文学运动，包括社会主义文学运动，究竟给我们留下了怎样的理论遗产？进入新时期，它还有将会继续起作用的东西吗？其意义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中国的自由主义文学在“今天”的发展和命运究竟如何，可能存在哪些陷阱？另一方面，他更重视的，是理论经验的总结。记得解志熙在充分地肯定了支先生的反思的深刻性及所表现出的“现实主义的历史态度”的同时，又对这样的反思所蕴含的“理想主义的历史设想”有所担忧。（参看《深刻的历史反思和矛盾的反思思维》，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2年1期、2期）志熙的担心可能有他的道理，不过，在我的理解里，支克坚先生对曾经存在的在诸如“文艺与政治关系”这些问题认识上的局限的反思，并非是要以今天的认识或自己的理想来苛求历史的当事人，而是着眼在理论思维经验的总结，而这样的总结的意义又是指向当代的，因为在他看来，像“文艺和政治的关系”这一系列的理论与实践命题不仅是历史的，也是现实存在，需要继续探讨的。也就是说，对支克坚这样的有着理论兴趣的学者，他们并不满足于作一个历史的叙述者，他们不仅要像解志熙说的那样，讲清楚“历史现象的实际到底是什么样的？”和“为什么历史恰恰是这样的？”（在这两方面，支先生的研究，都是作得很出色的），还要求自己从理论上对历史作出“有深度的总结”，其目的是要“经过自己的途径，用自己的方式，‘提高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和修养’”，以此参与当代思想文化建设。（《我们的学科需要这样的志士仁人》）

这样的总结，对他们自身的意义也是不可忽视的。支克坚先生正是因此为自己在现实的思想、文化、文学生活中的立场、态度，找到了历史的依据。因此，他对历史的反思，不仅包含了对自我曾经有过的历史迷误的反省，更有对某些基本文学和研究立场、观点经过反思后的坚守。我从支先生最后几篇文章中，就看到了他的四大坚守：坚守“现代文学和社会变革的密切联系”的文学传统，坚守“历史唯物

主义的文学观、历史观”，坚守“社会的历史的分析”的研究方法，坚守“历史感与现实感相结合”的学术研究传统。在提出这样的坚守的同时，支克坚先生又提醒自己与后人：坚守绝不意味着“再把自己封闭起来，应当科学地吸取人类认识客观世界、包括认识历史和社会的一切成果，人类认识人的精神活动的规律，包括认识文艺的规律的一切成果”（《论革命文学的理论遗产》）；坚守什么，是一种个人的选择，它既是区别于其他选择，又是以尊重不同于己的选择为前提的，因此，“最重要的，就是不再搞‘定于一’，不再指望吃掉别一方，当然也不追求双方融合。它乃是一种思考，一种探索，关于社会、关于历史、关于文艺的思考与探索”（《中国自由主义文学在昨天和今天》）。在我看来，这些都可以视为支克坚这位在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坚守到最后的老学者、老战士，留给我们的遗言和一个永远的探索者、思考者的形象。我们将永远怀念他，历史也不会忘记他。

2009年5月8日—10日

# 目 录

|          |                                                            |
|----------|------------------------------------------------------------|
| 001····· | 代序：“用个性化方式响应时代对这一代学者的要求”<br>——支克坚先生学术思想和贡献初议（钱理群）          |
| 001····· | 关于五四新文学传统                                                  |
| 012····· | 论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小资产阶级问题                                           |
| 036····· | 关于新文学的评价标准                                                 |
| 044····· | 鲁迅与中国现代文艺思潮                                                |
| 068····· | 论鲁迅“激进”                                                    |
| 082····· | 中国自由主义文学在昨天和今天                                             |
| 102····· | 两种文艺思潮比较中的鲁迅                                               |
| 118····· | 冯雪峰文艺理论的背景和内在矛盾                                            |
| 135····· | 从鲁迅到毛泽东——关于 20 世纪 30 年代到 40 年代革命文艺<br>思潮的变化，兼论周扬和胡风在变化中的地位 |
| 158····· | 鲁迅和胡适                                                      |
| 177····· | 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问题                                          |
| 187····· | 关于新时期文艺上不再提两个口号                                            |
| 217····· | 冯雪峰、胡风与中国现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流派问题                                  |
| 234····· | 论革命文学的理论遗产                                                 |
| 257····· | 解志熙著《美的偏至——中国现代唯美主义思潮研究》序                                  |
| 261····· | 我们的学科需要这样的志士仁人<br>——读樊骏《中国现代文学论集》之后想到的                     |
| 279····· | 答解志熙问                                                      |
| 289····· | 直面历史 独立思考                                                  |
| 308····· | 鲁迅的启蒙主义、革命文学的成败得失及其他                                       |

——支克坚先生访谈录(支克坚 邵宁宁)

### 评论与纪念

- 335····· 解志熙：深刻的历史反思与矛盾的反思思维  
——从支克坚先生的革命文学研究说开去
- 377····· 程金城：审视作为历史“中间物”的“他们”及其文艺理论“遗产”  
——评支克坚先生的《冯雪峰论》《胡风论》《周扬论》
- 387····· 周景雷：复杂的另一面仍是复杂  
——读支克坚先生的新著《周扬论》
- 393····· 吴小美：再对老支说几句话
- 396····· 徐改平：追忆支克坚先生
- 402····· 后记(邵宁宁)

## 关于五四新文学传统

五四新文学传统究竟是什么样的传统？在五四运动已经过去了整整 80 年的今天，这个问题，似乎仍旧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何以这样说？请看下面两段话。

一段是周扬 1954 年说的话。当时新中国成立不久，需要在全国范围内贯彻毛泽东规定的文艺的工农兵方向，又适逢五四运动 35 周年，周扬于是写道：

现在距离五四运动已经三十五年了……从五四开始的人民文学艺术运动，正以空前广大的规模，沿着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 and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而向前发展着。

五四文学革命提出了文艺上的现实主义的原则，提出了文艺为人民和社会的利益服务的原则，创造了以接近群众的语言描写人民的现实生活和斗争，反映人民的民主革命要求的文艺作品，这是中国文学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完全新的现象。<sup>①</sup>

另一段是谢泳不久前说的话，他认为：

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我们一向很注意五四新文学的传统，认为文学的发展无论哪一种思潮流派都与新文学的传统分不开，我们在强调新文学的传统时，对于发生在大学校园内的新文学传统又没有有一个明确的界定，所以常常把新文学的传统泛化，只要想抬高作家和流派的地位，总要将新文学传统拉上，其实文学传统和学术发展的承传有相似性，不进大学很难把握传统的真谛。至少我个人看来，解放区文学以及 1949 年后当代文学发展的许多重要阶段，是看不到五四新文学传统的。因为工农出身的作家文化素养一般都很低，偶尔接触一点新文学作品，还谈不

上对传统的继承；就是许多从大学走入解放区的作家，对新文学的传统也由于单一的意识形态主导一切，而被迫或自觉地远离了新文学的传统，1949年当代文学的发展，实际延续的是解放区文学的传统，而不是新文学的传统。当时的主流作家是工农出身，大部分知识分子型的作家早已放弃了写作，传统实际上是已经中断了。

五四新文化运动起源于大学这个独立的精神家园，最终的承传恐怕非靠大学不可。西南联大在抗战中所坚守的正是五四新文化的传统，无论是教师和学生，都将校园视为追求自由和民主精神的独立家园，在这里思想是自由的，个性是解放的，大家办事做人所取的标准是带有西方色彩的，正如王浩回忆当年联大生活时所说的那样，那是一个“谁也不怕谁的日子。”<sup>②</sup>

这两段话都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并且涉及许多共同的问题。其中最根本的，是解放区文学与五四新文学的关系，即解放区文学（及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学）于五四新文学传统是否有所继承，或者说它是否是五四新文学的继承与发展的问題。正是在这个问题上的截然相反的看法，表明了五四新文学传统究竟是什么样的传统，今天确实还有重新讨论的必要。

通常我们讲后起的运动对先前的运动的继承，是以什么为根据的呢？一个是方向，一个是精神。就是说，如果后起的运动在方向上、精神上与先前的运动有一致之处，也就表明它们之间可能存在着某种承传关系；否则，所谓承传，又从何谈起！当然，除了方向、精神，还有特点；然而特点是更为具体、因此也更容易变化的东西，所以主要还是方向和精神。

但并非世上发生的所有运动都有明确的方向；而没有明确方向的运动，也许对旧的有所破坏，却不可能有新的建设，因而结果大抵是烟消云散，在历史上留不下什么痕迹。五四新文化运动完全不同。这是一个以民主主义为基础的、探索着中国



社会的改造的运动。尽管在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新中国以及怎样建立新中国的问题上，认识极不一致，但黑暗的、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旧中国必须推翻，这个新中国必须是民主的，因此才是光明的，对于这一点，大家的认识是十分一致的。同时，作为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工具的旧文学必须推翻，代之以民主主义基础上的新文学，这一点大家的认识也是一致的。这里表现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方向。陈独秀谈到文学上的破旧立新时曾说：“吾国文学界豪杰之士，有自负为中国之雨果、左拉、歌德、霍普特曼、狄更斯、王尔德者乎？有不顾迂儒之毁誉，明目张胆以与十八妖魔宣战者乎？予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sup>③</sup>在这迄今读后仍令人奋起的话里，又表现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特有的义无反顾的精神。

像这样的运动，由于它集中了历史的和现实的矛盾，是这些矛盾的一个总爆发，因而必定要继续向前发展。这是解决这些矛盾的要求，时代的要求。会有高潮和低潮，大的和小的曲折；更会不断出现新的特点。但指望它不发展是不可能的，不让它发展更是不行的。而它的发展所取的方向，又必定始终是面向社会、面向历史的方向，文学也是如此。诚然，五四新文学，是以“人”的发现为起点，它最初的阵地是北京的大学，但那是因为，新的历史只能从这里起步走。启蒙运动本来就是主要以知识分子为对象的运动；而当时的农民，又能有怎样的运动呢？义和团式的？阿Q式的？至于文学，更与他们隔着鸿沟。然而，当我们一再强调周作人所说“从新要发见‘人’，去‘辟人荒’”<sup>④</sup>的重大意义的时候，不应该忘记鲁迅稍后曾指出“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sup>⑤</sup>，因此它终究必须深入到国民中去。我们尤其需要重温郁达夫的一段话：

综观新文学内容变革的历程，最初是沿旧文学传统而下，不过从一角新的角度而发现了自然，同时也就发现了个人；接着便是世界潮流的尽量的吸收，结果又发现了社会。而个人终不能遗世而独立，不能餐露以养生，人与社会，原有连带的关系，人与人类，也有休戚的因依的；将这社会的责任，明白剝切地指示给中国人看的，却是“五卅”的当时流在帝国主义枪炮下的几位上海志士的鲜血。<sup>⑥</sup>

中国人，永远记住这些志士们的鲜血吧！是它使我们懂得了应该懂得，必须懂得，而暂时却还未能懂得的东西。这是中国人认识上的一个进步，重大的、具有历史意义的进步。郁达夫所描述的就是这个进步。它把中国人改造世界的斗争，推翻旧中国、建立新中国的斗争，推进到了一个新阶段。新的认识，新的斗争，跟五四时期自然有很大的不同，但它难道不是五四新文化运动面向社会、面向历史的方向的一个重要的发展吗？笔者在前面已经说过，像五四新文化运动这样的运动，要它不发展，是不可能的。现在还必须补充一句：在它的发展中，要它不起变化，也是不可能的。然而，无论它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以致形成了新的运动，只要方向不变，这新的运动就仍旧是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仍旧是对它的传统的一种继承，虽然这时传统不仅有了新的特点，甚至还有了新的性质。

五卅作为中国现代革命进入一个新阶段的标志，给新文学打上了深深的印记。不仅仅是出现了一批以它为题材的文学作品，而且影响到整个文学的特点乃至思想基础。郑振铎曾对他所谓“五四时代的文学”和“五卅时代的文学”的特点分别进行概括，又放到一起作了比较。他以个人的、普遍性的、浮面的、幻想的、旁观的为前者的特点；又以群众的、带阶级性的、深刻的、真实的、参与的为后者的特点<sup>⑦</sup>。笔者曾经在另一篇文章中提到，这种概括并非完全准确，这种比较也有不够清晰之处，但中国现代历史的发展到了五卅时代，产生于五四文学革命中的新文学已经起变化，却是事实。能够说五四新文学传统至此中断了吗？或者因此中断了吗？不能这样说。因为，文学并未抛弃社会改造的主题；恰恰相反，是在新的思想基础之上，在进一步面向社会和面向历史的基础之上，大大拓宽和加深了这个主题。

中国现代新文学的历史，五卅之后是著名的30年代，30年代之后是40年代，这时也就产生了解放区文学。如果说五四时期周作人所倡导的“人的文学”，说到底不过是知识分子的文学，那么，在解放区，则是工人农民也要做“人”，文学要把工人农民也当做“人”。在这个意义上，解放区文学跟五四新文学传统，不消说没有任何相悖之处，反而因其更加深入了历史前进的潮流，使五四新文学传统得到了历史性的发展。联系中国现代社会那一场翻天覆地的变化来看，五四新文学传统如果不从这里得到发展，又从哪里得到发展？五四新文学不走向这里，又走向哪

里？30年代，梁实秋讲过一些颇为有名的话。他认为：“‘大多数的文学’这个名词，本身就是一个名词的矛盾，——大多数就没有文学，文学就不是大多数的。”<sup>⑧</sup>还认为：“好的作品永远是少数人的专利品，大多数永远是蠢的永远是与文学无缘的。”<sup>⑨</sup>倘使不许五四新文学的传统有任何的发展，把五四以后具备了新的特点的文学都看作跟五四新文学无关的东西，那五四新文学岂不是只有倒退，而且是按照梁实秋的主张倒退？

所以，问题并不在于“把新文学的传统泛化”。因为这里说的是五四新文学传统，是解放区文学跟五四新文学传统的关系。假使是具体地谈某个作家，某个流派，那又是另一回事。比如我们讲鲁迅，讲对鲁迅精神的继承，自然马上就会想到胡风；这时倘若拉上所有的革命作家和进步作家，倒确有“泛化”之嫌。问题也不在于要“抬高”解放区文学的地位。应该说在过去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确曾发生过“抬高”解放区文学的情况，但那靠的不是硬把它跟五四新文学传统联系在一起，而是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权威。老实说，解放区的作家，也不需要依靠跟五四新文学的传统的关系来“抬高”自己。盖因他们并非都是“工农出身”，其“文化素养”也不都低于大学校园内的人们；即使是“工农出身”，五四新文学传统对他们也并非如天边的月亮，可望而不可即。问题倒是在于，今天有些人把五四新文学传统静止起来了，绝对化了。30年代，瞿秋白看不到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发展，他认为这只是“一个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启蒙主义的文艺运动”，因而对它作了彻底否定。但瞿秋白认为为了实现他所说的“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任务，这个运动应当发展，只是必须割断原来的传统，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我们要有一个‘无产阶级的五四’”<sup>⑩</sup>。至于今天的有些人，则是在对五四新文学传统充分肯定的同时，否定它后来的任何发展，认为必须按照原样来继承，而且认为只有这样的继承才是真正的继承。

认识一个历史上的运动，认识它的传统以及后来的运动对这个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并不是一件轻易可以做到的事。应该站在新的历史高度，但这跟按照今天的某种需要来评论历史的运动，对待历史的运动，完全不是一回事。而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后一种情况可以说是屡见不鲜。上面提到30年代瞿秋白彻底否定五四，是为了通过这种否定来树起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旗帜。也有另一种情况，即对五四新